展示的愿望

——首届“中美文化艺术论坛”侧记

2011年12月4日• 财新专栏作家李大卫

财新传媒
Caixin media

开放性与自发性

首届“中美文化艺术论坛”于11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举办。主办方包括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，以及两个美国非政府组织——美国亚洲协会和阿斯彭协会；活动内容包括艺术表演和圆桌讨论。这真是一个讨好又讨巧的策划。来华的嘉宾都是当今美国文化界的顶级人物，包括奥斯卡影后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、大提琴家马友友、华裔作家谭恩美、汉学家史景迁等。据美国亚洲协会介绍，这次论坛的宗旨，是为美国艺术家与中国同行的合作、对话提供机会，以促进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直接交流。

开幕式17日上午在国家大剧院举行。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开幕演讲中，强调了避免文化上误解的重要意义。他指出，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里，中美两国之间不时相互使用一些强硬的措辞，合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显得尤为重要。

两天的议程中，来自主客双方的文化界名流，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，发表了不少独到见解。在整个讨论过程中，我听到最多的几个词，是“创新”“创造性”和“软实力”。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·奈提出“软实力”以来，这一概念常常被用来表达政府试图繁荣文化事业的决心。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，就是与GDP一起占据“微笑曲线”的两个高端。然而，许多人也许恰恰忘记了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对这一概念的解释——“软实力”，是政治制度的吸引力、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。约瑟夫·奈特别强调“软实力”的自发性，“并非总是由政府直接掌握，它往往表现为非政府组织，以及各种民间或国际机构，而且难以计量和管理。”

当本届论坛还在筹备期间，《纽约时报》曾经为此采访过主办方之一、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（Orville Schell）博士。他也强调，论坛的宗旨在于展示美国文化的开放性和自发性——“最好的方式是展示，而不是说教。”

当下的中国人，其实不乏展示的愿望，从北京奥运会、上海世博会，到今年8月首次在“世界十字路口”之称的纽约时报广场上，与五粮液和可口可乐同台亮起的新华社广告片“中国屏”，无一不是这种愿望的迫切流露。但并非一切展示都是很快呈现效果的，重要的在于它们是否具有自发性。

正如西方人往往对于中国的形象展示抱有怀疑甚至紧张的态度一样，在座的一些中国代表，似乎难以摆脱某种焦虑情绪。这种焦虑，关联着中国产业的发展水平、民族的文化形象，以及生态环境资源的现状。问题在于，一些人把文化想象成某种一本万利的无烟工业，或是改善自身形象的捷径窍门，恐怕很快会大失所望。

在两个世界中成长

大提琴家马友友及作家谭恩美，这两位华裔在美国文化界享有盛名。以他们为嘉宾的单元讨论开始前，有个预先安排的小插曲：街舞明星查尔斯·莱利介绍了他和马友友的渊源，然后失重般地施展了一下身手。要想证明一种文化的自发性，恐怕没有比这个非洲裔小伙子更加称职的代言人。在他身上，你肯定看不到赵本山、周立波身上那种政治伦理符号的重负。

讲演主要围绕着他们各自在移民家庭中的成长经历进行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，他们背后都有至少一位“虎妈”式的中国家长。谭恩美的母亲告诫她不能主动亲吻男生，否则就会出事；她靠强制手法，防止女儿陷入危险，希望女儿好好念书，弹钢琴，变成马友友那样的音乐家，结果迎来的却是她的青春期反叛、吸毒，还进过监狱。后来她们移民去了瑞士，在白人环境中，她找不到男孩约会，怀疑那是因为自己长得丑。于是她问母亲：如果回中国，她会不会被看成美女？

谭恩美的叛逆经历无疑影响了她的写作生涯，其中母亲的影响显然更加深刻。首先是对细节的观察力，这对一个作家至关重要。她说她的母亲可以从一些细枝末节看出一个人的品行。她有过一个男朋友，吸毒，行为不端，就被母亲一眼看穿。1987年，她平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，置身于身穿蓝制服的人群，她的洋装，她的首饰，她对隐私的看重，都证明她已经不是中国人。

出生于巴黎的马友友与谭恩美相反。他的家庭是从欧洲移居到美国。从巴黎到纽约，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——到处是摩天楼，奶酪的形状也不一样。他经历的反叛是渴望逃避，一种想象中的逃避。早年

他梦想去巴西，南非也好。父母从小告诉他，中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化。他的困惑由此而来——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他们要搬来法国呢？后来他们移民美国，又说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。对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，这些自相矛盾的说法，都要通过漫长的探索，在飘移不定的文化身份中寻找答案。

两位主讲人后来都选择了异族配偶。谭恩美说，她无法和华裔男生约会，因为他们太像兄弟，感觉如同乱伦。马友友解释说，这是因为华裔是一个太小的少数族群。

我不知道这种表达是否更多是源于一种对于自己身份的逃避——整个讲演过程中，这种困惑一直没能摆脱。我不理解华裔美国人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，除了政治制度与地域的关系，在多少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的背景？而国家与国家之间、种族与种族之间，是否有可能获得文化认同？当年轻的记者们举手纷纷提问，我突然意识到，今天的中国社会，同样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满于自身文化处境的情绪。

史景迁："我不敢肯定"

史景迁（Jonathan Spence）最知名的著作《追寻现代中国：1600－1912年的中国历史》被认为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文本之一。作为一名杰出的史学家、高产的作者、评论员和杂文家，他在中国学界和读者中享有盛名。能够采访到他，是参加本次论坛最感到安慰的环节。他博学而健谈，可惜由于严格的时间限制，话题无法更深入展开。史景迁是美国畅销书榜的常客，而在中国，相当一批知识分子审视、叙述本国历史的眼光，就是从他那里"借来"的。寒暄、落座之后，话题从"创新" 这个论坛的关键词说起。

"我不敢肯定"——这几乎成了史景迁的口头禅，不知道是否因为历史学者的谨慎。他说人们回顾历史，会发现古代中国在许多领域多有创新，成就卓著，不论在科技、教育还是文官遴选制度等重要方面。他认为直到明代，中国都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家，从工程技术到对外关系多个领域，全都有所表现。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令世界震惊，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知识；至于后来的衰落，或许由于中国过于激烈的政权更迭方式，不利于知识和财富的积累。直到明清鼎革之后，还有黄宗羲、顾炎武这样的遗民，这样的百科全书式人物，在投入抵抗运动的同时，游历山川大地，积累各种门类的知识。此后技术文化创新被抑制，也许是出于后来的现实政治。

关于中国目前的状况，他说自己毕竟不是经济学家，也不了解科技领域的发展，不便妄下结论。但中国人的求新欲望之强烈，令他印象深刻。他指着我的录音笔说："就连你这样的人，不也把样子旧一点的电子产品叫做古董？"

之后我们谈到历史的书写和教学。史景迁说他从不相信单一的历史叙事，尤其当某些时段的历史记录经过大量的"编辑"之后。他自己之所以对中国历史感兴趣，是因为早期做研究时发现，关于中国晚近时期的历史，即使中国内部的说法，也有很大差异。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。比如很多涉及到共产党的材料，在台湾遭到查禁，于是就要通过其他方面探究真相如何。叙述者在本质上是不可靠的，如何在虚构和真相之间做出判断，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，就像科恩兄弟在电影中表现过的那样。此外也要考虑到叙述者的现实处境，比如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史官，怎么可能秉笔直书？

研究历史是一个投入生命的体察过程，很多细节描写或许带给人们更多启示。比如研究张岱的作品时，史景迁发现一些微观叙述更能展示晚明生活的真实场景，妇女、儿童的生活，甚至踢足球的描写。足球是个令人开怀的话题。大笑起来的史景迁，让人想起进入老年的肖恩·康纳利。但告辞的时间已经到了。我趁机拿出一本20年前他为我签过名的《胡若望的问题》，请他再签一次留念。他欣然同意。我发誓说："请放心，我不会拿去拍卖。"

穿越身份的对话

此次论坛单元众多，但主题环扣勾连，最终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。美国亚洲协会显然进行过精心设计。为此我采访了该协会的纽约博物馆馆长招颖思（Melissa Chiu）博士。

近十几年来，"策划"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。招颖思说，在美国，策展人不仅要把展出的艺术品介绍给公众，同时要对展品进行"编辑"——你得负责把这些展品组织成一个观众可以明确感受到的叙事。中国的策展人的职能，也应从收集作品转移到策划和公共教育上。

招颖思认为，今天中国艺术面临的挑战，是如何形成有活力的艺术机制，来与市场经济和谐共处。比如美国，资本市场之外，有完善的博物馆、美术馆体系，有许多非盈利机构或项目支持艺术发展，整个艺术生态是平衡的、多样的。

话题转到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国艺术家。招颖思认为，这批艺术家与留在本土的同行相比，对不同世界的文化差异更为敏感，不管是在纽约、巴黎还是悉尼；同时他们也更强调自己的中国特性，在创作中自觉引用中国的符号和材料。虽然进入新世纪后，越来越多的海外艺术家回国开设工作室，两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。

徐冰与刘小东两位艺术家之间略带戏剧性的对话，恰好可以佐证招颖思上述观察。徐冰是在美国最成功而近年来回到中国的艺术家，刘小东则在国内创造了当代作品拍卖价格的最高纪录；徐冰主张艺术家疏离，刘小东则赞成介入，政治观点看上去也更激进一些；徐冰认为当代中国人对于艺术语言本身，基本没有很大创新和贡献，刘小东则坚持艺术首先要关注社会的巨大变迁，而不是技法问题。他们之间的观点冲突，反映的不仅仅是艺术圈的问题。

美国大牌电影导演乔尔·科恩，自然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。中国记者对他的提问，涉及到他本人是否有计划到中国拍片，或在未来新作中加入中国元素。科恩尚无此打算，但他承认亚洲对于美国电影的影响正日益显著。他说："有一些风格和表达方式上的影响，其中有些东西，甚至可以放到最美国化的故事里，虽然你从电影里，很难看出和外国文化有什么明显关联。"

主持人请科恩谈谈如何看待张艺谋重拍他的黑色片《血迷宫》。他说不敢肯定是否看懂了《三枪拍案惊奇》，但张艺谋把故事场景移植到一个18世纪的拉面馆，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改变。他认为这种做法非常怪异，他不明白为什么张艺谋非要改编一部老片，而不去做一个差不多的故事。"他把外来元素和自己的固有风格兼容并蓄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的观念就得非常开放，这样才能吸收各种不同的东西。"

大导演乔尔·科恩对《可可西里》的导演陆川的作品恭维备至，包括饱受争议的《南京！南京！》。科恩谈到了他多年前的《冰风暴》。这部基于真实故事的影片，同样涉及到真实性的问题。

美国名厨、社会活动家爱丽丝·沃特斯的到来，应该是本次活动中最有创意的策划。她是国际"慢食运动"的领导人，早年在加州伯克利合办了著名的帕尼斯餐厅。"帕尼斯"这个名字，取自一部表现马赛工人生活的影片，总之很"法粉"，很"左倾"。沃特斯坚持选用最新鲜的本地当令食材，使用最简单、最传统的烹调方法。她后来又在该市的马丁路德金中学，创立了一个"可食用校园计划"，内容无非是让学生全程参与食材的种植、收获和烹制。健康食品的意义，也正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理解。经营有机农场的年轻女孩石嫣，近年则致力于恢复中国的农耕传统。以她的介绍，中国正面临严峻的环境问题，如果继续沿用目前的农业技术，中国的土壤质量将会下降到危险的水平。

身份特征的模糊，乃至彼此穿越，或许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特征之一。论坛把最后一个讨论单元留给了梅丽尔·斯特里普、葛优、刘烨这些电影明星，他们都是身份穿越的专家。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何敬生点出了这场讨论的主题：叙事是艺术家和文学家们工作的核心，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，都在互相讲故事，讲述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的生活与情感。因此我们向对方讲的故事非常重要，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是在做一个政治、道德上的选择，也是我们成为人类的一个基本因素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、作家包柏漪曾把美国使馆和新闻文化处，变成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，经常组织各种文化沙龙。随着"冷战"结束，美国曾一度不再热衷于展示国家的"软实力"。如今，事情好像又在起变化。

作者为财新《新世纪》驻纽约特约记者